

# 新中国外交思想：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叶自成摇著

北京 大学出版社  
北摇摇京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叶自成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圆园园远

摇 圆园园远年 远月第一版 圆园园远年 远月第一次印刷

摇 I 援新... 摇 II 援叶... 摇 III 援外交理论—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摇 IV 援 圆园园远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远)第 圆园缘园号

摇书 名：新中国外交思想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摇著作责任者：叶自成著

摇责任编辑：金娟萍 摇吉宛

摇标准书号：圆园园远 远月第一版 圆园园远 远月第一版 圆园园远 远月第一版 圆园园远 远月第一版

摇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摇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摇 圆园园远

摇网 址：<http://www.pku.edu.cn>

摇电 话：出版部 圆园园远 远月第一版 圆园园远 远月第一版 圆园园远 远月第一版 圆园园远 远月第一版

摇电子信箱：[zhuangyue@pku.edu.cn](mailto:zhuangyue@pku.edu.cn)

摇排版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摇 圆园园远

摇印刷者：

摇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摇经销者：新华书店

愿 圆毫米 伊 愿 圆毫米 摇 粤 开本 摇 员 缘 缘 印张 摇 圆 圆 千

圆园园远年 远月第一版 摇 圆园园远年 远月第一次印刷

摇定 价：圆园园远元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国家教育部跨世纪  
人才培养基金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基  
金的赞助  
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第一章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外交思想绪论

##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现状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总体研究中,是一个很弱的部分。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我国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研究课题。据有关材料统计,从 1956—1976 年,报刊上发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 万多篇,印了 100 多种著作,1976—1985 年的 10 年中,又有 1000 篇文章和 100 多种著作问世。

这些文章和著作对毛泽东生平和各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总起来说,它们在毛泽东的哲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甚至经济学的思想的研究方面获得的成果较大较多,虽然这些方面的研究在深度上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理论分析较弱,视野不够宏阔,但毕竟取得了巨大成绩。相比较而言,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研究应当算是最弱的一个方面,不仅数量少,且就其质量而言,也大有进一步努力和深入的地方。<sup>①</sup>

比较集中地论述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成果有 1983 年由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 100 周年而召开的毛泽东外交思想讨论会的论文集《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该论文集是在这一方面较有权威性的较全面的一个成果,论文的作者都是从事外交外事的专家和领导者,具有较丰富的外交外事经验,

---

<sup>①</sup> 参见曾长秋《近十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综述》,《湖南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第 70—72 页。

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具有与一般的研究者不同的视野。论文的作者从外交、国防、对外宣传、外贸、文化交流等不同的角度对毛泽东的外交外事思想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也有一些学者从学术方面对毛泽东的某一外交思想进行了论述分析,是国内水平较高的一次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交流。

在 1993 年毛泽东诞生 75 周年之际,国内还出版了大量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对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三个世界的划分、国际战略思想、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又先后整理出版了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文献,如《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一批回忆录,这对加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条件。<sup>①</sup>

### 圆援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 (员) 毛泽东对内思想和对外思想的关系与区别

正如钱其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生 75 周年而举行的毛泽东外交思想讨论会上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也是当代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他为我国外交战略的确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建立了辉煌的历史功绩，他的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永远是我们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sup>②</sup>。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就不完整。毛泽东思想中的对内部分和对外部分，是一个整体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毛泽东对内思想对其对外思想有重大影响，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扩展。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延伸，带有明显的从军事角度观察问题的印迹。

<sup>①</sup> 参见石仲泉、唐洲雁：《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若干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3 年第 5 期，第 53—54 页。

<sup>②</sup>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 页。

第三世界论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在农村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 supports 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影子。对毛泽东来说,第三世界就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大农村,中心城市就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是毛泽东世界战略的农民兄弟,它们人数多,占据着广大的地区,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依靠力量。

中间地带论则反映出毛泽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的反蒋斗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广大的西欧国家就是中国在反对美国的斗争中应当争取的同盟军,但也是不可靠的,必须又团结,又斗争。

对内思想决定对外思想,对外思想为对内思想服务,对外思想受对内思想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对内思想。如毛泽东在判断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的时候,较多地受到了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国际共运争论的看法的影响,毛泽东正是在批判苏联国内放松阶级斗争从而出现修正主义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

这些说明,毛泽东的对内思想与对外思想是分不开的,是统一的,但两者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例如,毛泽东的对内和对外思想都受到毛泽东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带有它们的深刻的烙印。但比较起来,毛泽东在对内思想上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尤其是其晚年的思想,左的东西较多,脱离实际较多。毛泽东在 1957 年后,其对内思想逐渐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先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批右倾、开展社教运动,后又搞“文化大革命”,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中国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并在实践和理论上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但在外交方面,则有所不同。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19 年中,除“文化大革命”中有“世界革命”的明显的错误倾向外,大部分时期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没有重大的错误。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的许多意识形态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在中苏两国关系上,毛泽东则是一贯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反对任何来自苏联的控制中国的企图,具体表现在反对苏联提出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建立长波电

台等有损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要求；在与苏联和美国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不渝地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中国的一个外交战略重点，为中国成为世界格局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打下了基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还英明地作出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重大决定。

可以说，毛泽东的对内思想受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极深，同时又自己创造出的一套偏离发展轨道的独特的错误理论，因此造成了巨大的错误。但在外交上，毛泽东较为一贯地坚持了他本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较早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外交活动中鲜明的表现出务实的风格。毛泽东的对内思想，以 1957 年为界限，前后两个时期是相互割离的，后期的思想完全脱离了前期的思想方法和路线，而在外交方面，两个时期则有较强的一致性，后期对前期的许多思想都有继承和发展，如独立自主思想，起源于过去与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涉作斗争的过程，后来发展到反对苏联大国干涉，反对美国威胁，1957 年时提出的“中间地带”论，后来在 70 年代发展为“第三世界论”。

如果说，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对毛泽东的对内思想重大修正的话，那么在对外思想上，邓小平的理论却较多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

例如，中国在英国当局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搞所谓“直接选举”时，邓小平确定了“另起炉灶”的方针，而这一思想在 1957 年 7 月毛泽东就提出过。毛泽东在当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外交方针，一是“另起炉灶”，一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关于这两点，周恩来后来在 1957 年 7 月 10 日的一次讲话中解释到：“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中国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sup>①</sup>。又如，毛泽东曾经预感到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破裂，在 1957 年 7 月就说过社会主义阵营就是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7 页。

崩溃了；也没有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sup>①</sup>。而后来邓小平在谈到苏联东欧剧变的世界形势时，不仅思想与毛泽东相似，而且连语言范式都极为相近，提出“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sup>②</sup>。又比如，邓小平同志在访问日本时说，如果钓鱼岛问题现在解决不了，可以留给后人解决，这一思想也是毛泽东曾经讲过的。1979年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讨论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主权分割时，毛泽东提出两国各一半，如谈不到一起，就拖下来，将来再解决”<sup>③</sup>。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也是对毛泽东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1957年12月16日就曾经说过：“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sup>④</sup>。邓小平在1978年同样指出，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我们也要尊重台湾的现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sup>⑤</sup>

如果说毛泽东的对内思想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具有理想主义和空想成分，那么，毛泽东的对外思想则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特色。同样，毛泽东的对内思想表现为冒进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对外思想方面则表现的较为稳重，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中美建交，反对美国和西方禁运，中国加入联合国等，毛泽东是一点也不着急，反而认为晚建交，暂不加入联合国对中国更好些。为什么毛泽东的对内思想和对外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差这么大，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谜，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 （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同一性和一贯性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像他的哲学思想一样，表现出大家风范，具有

①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7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47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47页。

⑤ 参见《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1—152页。

明显的跳跃性，深刻的洞察力，博大的胸襟，高瞻远瞩。

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宏观的哲学性。1972年7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向毛泽东提出要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惟有我们着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全球的主要力量，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些问题已经够宏观的了，也是两个大国领袖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毛泽东却说：“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深，反倒是喜欢你的哲学讨论”。对尼克松来说，讨论全球问题也就是讨论外交哲学的宏观问题，而对毛泽东来说，这些还不是他理解的外交哲学。<sup>①</sup>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不仅亲自作出各种决策，而且为制定这些决策做了大量的直接工作，他通过与各种不同的外国客人的会见，了解各国的情况，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依据。毛泽东曾经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据曾在中联部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淑铮同志介绍，从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7月的5年间，不完全的统计，他先后会见了来自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各界人士。<sup>②</sup>

毛泽东曾经要求从事外交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有主动性和大气魄，他曾就对美斗争批示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sup>③</sup>。这段话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家的大气魄。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新中国的重大的外交活动，几乎所有重大的外交决策，都要经过毛泽东的深思，其中最能表现毛泽东外交大战略手笔的是中国脱离苏联影响和中美两国改善关系。

在判断国际形势上，毛泽东的有些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例如，毛泽东在1972年曾经对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因此：“我们

<sup>①</sup> 参见《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83年7月14日。

<sup>②</sup> 参见《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第156页。

<sup>③</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56页。

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sup>①</sup>。也就是说,毛泽东并不认为冷战对峙状态是和平共处,不认为似乎只要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就是和平共处,而这种观点是一般人所接受的。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强调在一组矛盾中,要找出主要矛盾,集中主要精力解决主要问题。这在外交思想中也有鲜明的反映。毛泽东从新中国建立起直到晚年,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一方法。他关于美国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要矛盾,苏联是新中国 1949—1979 年代的主要矛盾,关于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的思想均是这一方法论的体现。为了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最大的超级大国控制世界,毛泽东把争取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争取最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弱化美国或苏联一国或两国联合控制世界的局面,促使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从表面看,毛泽东当时决定与苏联断绝关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首先,这关系到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重大的战略选择。中国在建国初期几乎完全照抄苏联模式,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苏联是当时公认的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也是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发源地。但毛泽东早在 1956 年就已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病有所认识,怎样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是毛泽东后来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独立自主地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其次,中国与苏联关系断绝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大国主义发生了矛盾,苏联试图在意识形态的旗号下控制中国。为了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毛泽东采取与苏联逐步脱离关系的措施。

中国与苏联从结盟到成为敌对国家,甚至发生武装的边境冲突,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94—195 页。

是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个战略性的转变。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发生急剧变化。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况。美国与中国在朝鲜打了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与中国在越南打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对中国一直采取遏制和封锁的立场。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在进入联合国问题上,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上,一直受到美国的压力和干涉,因此也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但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做出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战略决定,从此改变了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敌的状况,使中国从中获益匪浅,也导致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后来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中国能不能顶住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巨大冲击,能不能得到西方的大量的资金和技术,都是个很大的问题。

毛泽东作为一代外交大战略家的风采还表现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而许多主持正义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了许多努力。但毛泽东为中国制定了不急于加入联合国的方略。毛泽东指出：“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是希望让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它的本意：“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见得。”当然：“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

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sup>①</sup>毛泽东指出,不是中国不想进联合国,而是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但中国并不因此而看轻自己,因为“中国很大,自己要办的事很多……中国也是一个联合国”<sup>②</sup>。

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发展也表现出惊人的预感力和洞察力,他在 1950 年曾预言中美两国要再有 15 年才能建交,后来果然中国与美国在 1972 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他又认为,中国发展要有 100 年时间,而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计划,就是将新中国建国 50 周年的 2000 年作为中国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标志年份。

1959 年毛泽东就预见到了美国对古巴要实行全面禁运,但又指出古巴不会屈服。毛泽东是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的。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sup>③</sup>。1960 年后,美国果然对古巴采取了全面禁运的措施,而古巴也像毛泽东曾经预言的那样,一方面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损失,另一方面也没有被美国压垮。

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虽然也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毛泽东根据美国在台湾的卷入程度,也深知台湾统一的复杂性,因此在 1955 年与基辛格会谈时提出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可能要 100 年的预言,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台湾问题的解决的确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很长时间。

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这在外交思想上也体现得很明显。他 在外交思想上最高明的方法论,并没有什么奥妙,其真谛就在于抓住主要矛盾。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建国初期,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为此毛泽东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在外交上不搞什么平衡外交,而是通过与苏联结盟,从

①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94 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94 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94 页。

苏联那里争取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宝贵的人才、经验、技术和资金；当中国受到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的威胁时，毛泽东又在两个威胁中找出对中国最突出的威胁，并把苏联作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从而作出与美国改善关系来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抉择。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家的气质也影响到他的外交战略。毛泽东经常用他的军事方面的战略眼光来分析国际形势，并具有很深刻的见解。他从军事学的角度分析出美国和苏联都还没有准备好打世界大战，因为它们的兵力太分散，无法在多条战线上同时进行军事行动；在思考中国一旦遭到苏联或者美国的入侵时中国应当采取什么策略时，毛泽东曾经对基辛格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但他们在中国肯定会感到不舒服，最后会被中国拖垮。毛泽东的思路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当苏联进攻中国，中国将采取的策略是“敦刻尔克策略，就是允许他们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以及上海，透过这样的战术，我们将成为胜利的一方，敌人将会遭到击败。世界大战，第一次与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而后来也都打赢了”，当然，毛泽东从传统的战争战略来理解现代战争也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所以当基辛格问，如果苏联只使用炸弹而不派兵中国该如何时，毛泽东对这样的问题似乎就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了。<sup>①</sup>

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在外交上较为充分地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大外交战略家的恢弘气势和宽阔胸襟，但在不少外交工作上，毛泽东也有他的细心的一面。例如，1973年缘月，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的黄华就面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事，请示中央，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复电中，对黄华在会见中的言行作了极为仔细的指示。他要黄华在会见时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少说多听，并指出请示电中关于“空言无补，需要

<sup>①</sup> 参见《美中 70 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台湾《中国时报》1993 年 1 月 14 日。

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的说法有毛病,应明确要求美国停止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和干涉中国内政,如美国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应断绝和国民党的一切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因为这样的说法似乎给人以一种印象,好像中国共产党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好像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少了一些。毛泽东还指示说,黄华应申明,这次会见是非正式的,在谈话之前,黄华应与市委商量会见的情况,如果司徒雷登态度友善,黄华也应取适当的态度,但不要过分热情,应取庄重和气的态度,对于司徒雷登表示愿意继续当大使并和中共办交涉修改商约事,黄华也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sup>①</sup>

### (猿)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来源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来源问题,是一个迄今为止很少人涉及的问题。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战略家,但从他的经历和生涯中可以看出,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外交历史和理论的熏陶,更不知道西方的外交理论,但他在处理外交问题时,尽管有失误,总的来说,是正确地处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许多重大问题。在毛泽东外交生涯中,最精彩的是三个方面:第一,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不搞平衡外交,而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为新中国成立后能依靠苏联的支持,很快在国际上站稳脚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作为一个弱国,在强国面前,不低头,不屈服,高举独立自主的旗帜,使新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的一员,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第三,1972年代做出了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战略性决定,与中国最大的敌人美国改善关系,为日后形成联美抗苏,中国对美国开放打下了基础。这其中自然与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建设自己的国家,使中国国力得到提高有关,但毫无疑问,作为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外交智慧和外交思想,在这一个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外交智慧来自何方?又是怎样形成和产生的?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61—162 页。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当代世界外交思想中一个独特的流派，即中国流派。它可以说是三合一的产物。首先，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和平哲学的继承者，有着浓厚的中国儒家哲学的色彩；其次，它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时又是列宁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外交思想的矛盾交汇；最后，它的最主要来源还是革命实践中的外交活动。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外交思想，马克思、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本人务实的外交实践，是毛泽东外交哲学和外交思想的三大来源。

在这三大来源中，应该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毛泽东真正的涉外生涯，可以说是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开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发端于民间外交，起源于党际关系，从党际外交思想开始发展为国家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

起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完全服从和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当共产国际的路线较为正确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发展，反之则遭受重大挫折。但从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由于毛泽东等人开始根据中国国情来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开始慢慢发生质的变化，即从过去完全的“共产国际内部”关系，变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具有“外”的性质。到 1955 年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进入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处于“内外关系兼有”的时期。

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如此：对共产国际来说，一方面，1955 年共产国际调整领导和路线方针，承认各国共产党有权独立自主地领导本国革命，在组织上可以独立，共产国际不得干涉各国党内的组织事宜，在思想上提倡各国党反对教条主义，这就开始了各国共产党成为独立自主的政党的过程。此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及对具体事务的干预是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

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更由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国际共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实际上对各国共产党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和一定的支配权,对中国共产党也享有很大的权威性。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一方面,由于毛泽东思想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而一个政党成熟的外部标志就是独立地做决定,不容许外国党和领导人对自己指手画脚,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下达的指示,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或采取比较消极的立场,尤其是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人以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一些条条当作上方宝剑的行为,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的强有力的抵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可以不理睬共产国际,但绝对离不开苏共和苏联在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尽管名义上中国共产党可以完全独立行事,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总是经常向苏共和斯大林通报自己的各项重大决定,无形中把斯大林和苏共当作自己的领袖。

这种矛盾的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甚至没有随着 1956 年共产国际的解散而结束,因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即苏共和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变化。这种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就变为党与党,国与国的重叠交叉的相互关系,在其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关系所具有的两重性的影子。

这种关系对毛泽东个人的影响是很深的,因为共产国际和苏共、斯大林如何对待毛泽东,一直是构成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共关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毛泽东在创立中国革命根据地方面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国际共运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共产国际不得不对毛泽东本人表示尊敬。1956 年,共产国际曾在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英俄文译稿。抗日战争时期《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曾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毛泽东,并刊登了毛泽东与朱德的合影照片,实际上是公开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袖地位。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还在 1956 年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表示,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与毛泽东争权。但另一方面,苏共

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持怀疑态度，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为保持与美国的关系，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不愿与中国共产党发展过于密切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未真正大量援助过中国共产党，直到 1945 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才有所改变。而完全改变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态度则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发生直接的面对面的战争之后。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也是两种态度：一方面，是矛盾和斗争。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苏联的援助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实际上苏联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以特别的援助。它的援助，主要是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对此较为不满。当苏联与日本发生矛盾，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把保卫苏联放在第一位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抵制，把中国的国家利益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时双方关系就已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而带有国与国关系的内含，因此带有真正的外交的意义。另一种态度是，尽力争取斯大林和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为此，毛泽东不仅主动地自觉地把联合苏联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而且长期坚持主动向苏共和斯大林通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情况和变化，在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原则以及具体的重大问题上请示苏联，听取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例如，在建国前夕的 1949 年底，从 12 月到 1 月，中国共产党曾经三次致电苏共，就建国大计和增进关系听取斯大林的意见。第一次是 1949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国共产党 12 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在 1 月亲赴苏联，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第二次是 1949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 1 月你那商定”；第三次在 1 月 30 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说，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 1949 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